



# 上海，風雲 1911

陆其国 著

学林出版社



# 上海，风云1911

陆其国 著

学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 风云1911 / 陆其国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486-0150-0

I. ①上… II. ①陆…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7167号

## 上海, 风云1911



作 者——陆其国

责任编辑——刘文祥

特约编审——任余白

封面设计——魏 来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20 1/16

印 张——14.75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0150-0/K·12

定 价——32.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 序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陆其国完成了他的又一部力作《上海，风云1911》。记得2009年12月，他和宋路霞来我家看我时，陆其国曾讲起过，他当时正着手在写一本关于辛亥革命在上海的书。事隔一年，陆其国终于以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完成了这本“献给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作品。陆其国曾经发表和出版过中短篇小说和历史报告文学多部，后来随着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钟情，作品形式和内容多以文学与史学相糅，自成一家，日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包括这本《上海，风云1911》。

陆其国那次来我家，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进门时，发现他腿有残疾，当时他瘦削的肩上还背着一个硕大的双肩包，包里大概装了些什么有点重的东西，看得出他背着显得有点吃力。进了屋，还没等落座，路霞就笑嘻嘻地对我说，陆其国是我的“粉丝”。一听“粉丝”云云，当时我还真吓了一跳，我想这类词应该属于当今一些少男少女，至少是小年轻们鼓捣的名堂，而陆其国明明是个中年人，怎么还会成为我的“粉丝”。

这时候他已放下背包，从包中拿出一本本又厚又重的精装书籍，一看到这些书，我才恍然明白他的背包何以会沉重，以及路霞说他是我的“粉丝”的原因了。

原来陆其国带来的这些书，有的是我编，有的是我著，有的是我编著，总之，都是我写的一些书，有的年代已经很久了。它们包括《郑观应集》（上下册）、《郑观应年谱长编》（上下册）、《郑观应传》、《盛宣怀年谱长编》（上

下册)、《盛宣怀传》等。其中有些书还真的比砖头还要厚还要重,比如两大厚册的《郑观应集》就是。我早年写的如《郑观应传》这样的书,如今书店已很难看到,而这些书的售价都不菲,陆其国居然都有!他背着这些书来我家,他说,除了看望我,还有就是让我为他的这些藏书签名。怪不得路霞说他是我“粉丝”呢!

签完名(说实话,还真有些累),在接下来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了陆其国对晚清和民国历史情有独钟,他丰富的藏书中,被他视若珍宝的还就数晚清和民国史料。这其中包括日记、年谱、回忆录,以及各类档案汇编、史料辑录、笔记、资料丛刊等,然后每天晚上阅读研究、做卡片,现在这本《上海,风云1911》,就是他在平时紧张的工作之余,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坐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出来的。因为他写作是文学手法,却融于史学,所以他书中的文字就不似有的史学研究文章那么枯燥。在我看来,治史仅有“知”是不够的,还应该有“识”。要“知”并不难,多读史书便可,要“识”则不易,须从人所皆“知”的史事中,悟出他人所未“识”的蕴含,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学问的积累,还得有悟性,所以治史的高境界应该是由“知”入“识”。值得高兴的是,陆其国对这一点深有憬悟,他对我说,这样的境界正是他执著追求的。我想他经常发表在一些报刊上的历史文化随笔,可以见出他在这方面追求的一些端倪。而细心的读者在这本《上海,风云1911》一书中,同样可以发现他在这方面的追求印迹。

陆其国才五十多岁,对他的治学和写作来说,这样的年龄可谓是黄金岁月。在此,我祝愿他继续努力,继续有新发现,继续有新收获。

夏东元  
2010年中秋节



20世纪初的上海外滩

# 目录

序 / 001

山雨欲来风满楼 / 001

辛亥革命的重镇——上海 / 031

民军的力量 / 071

上海总动员 / 095

政权结构中的实力与较量 / 125

南京的召唤 / 158

新时代的复辟与反复辟 / 173

共和的前进与倒退 / 210

跋 / 226

# 山雨欲来风满楼

犹如蓄势已久的暴雨，这场影响中国未来命运的革命运动，经过剧烈的电闪雷鸣、狂风呼啸，终于骤然降临。

其实这场革命的缘起，早就酝酿着它的必然性，耐人寻味的是，这必然性结果却由某一偶然性引发。这就像一颗深埋的地雷，总有一天会炸响是一种必然，至于会由谁引发、以怎样的形式引发、具体在哪一天的什么时间炸响、结果怎么样等等，则充满着太多的变数；这变数就是偶然。谁又能想到，这场百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革命，竟然正是由于一个名叫孙武的革命党人，躲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22号楼上一间小屋中试制炸弹时，因炸弹意外爆炸而引发，并就此改变了这场革命爆发的时间。历史，真的有着太多不可思议的偶然与必然的纠集。

## 一颗炸弹引发的历史焦点

公元1911年，按中国农历，这一年是辛亥年。就在孙武研制炸弹不慎引爆前数月，一个同样怀着要推翻清朝政府的坚定志向的小学教员、革命党人张振武，从外地潜回武昌，他随身携带的黄色丝箱里，就装了一颗炸弹。

张振武，原名尧鑫，字春山，生于1877年，湖北竹山人。从湖北省立师

范学校肄业的那一年，他三十四岁，在他书生气十足的外表下，内里却蓄积着一股豪侠刚烈之气。那天，当他提着箱子走近戒备森严的武昌城门时，一个警惕性很高的守城士兵拦住了他，喝令他打开箱子接受检查。

当时张振武即使不是脸色苍白，心里也一定充满了紧张。他十分清楚，只要箱子一打开，他肯定完了。如果他还来得及引爆炸弹，那个守城士兵十有八九也会同归于尽。问题是，小学教员张振武此行并非为一己之事，作为革命党的一名代表，这次来武昌聚集，是要和其他代表一起商量策划反清起义。可以想见，张振武一旦出事，势必会惊动清政府，引起当朝统治者警觉，也一定会在武昌采用相应策略来对付，那时候革命党即使想提前起义，也会失于仓促而凶多吉少。

张振武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按守城清兵的要求，在身上找开箱钥匙。但上上下下摸了半天，钥匙没有摸出来，额上的汗却渗出来了。他的神情也开始着急起来，因为他掏遍口袋也找不到开箱钥匙。在守城士兵异样眼光的注视下，“钥匙掉了”可能成为一种谎言而被怀疑。不得已，他对守城士兵说，我一定要让你检查我的箱子，这样你放心，我也安心。现在钥匙丢了，别无办法，我来砸锁吧。话音刚落，就见他高高抡起右手，然后握起拳头，像拿着一把榔头似地朝箱锁狠狠砸去。几拳下去，箱锁没有打开，他的手却已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史书上说，张振武当时“以拳碎锁，血溅衣袖，守卒惊愕不复疑，放入城”。

张振武使出苦肉计，终于化险为夷。

现在再回到孙武和他的那次“意外引爆”事件上来。

孙武，原名葆仁，字尧钦（或尧卿），号梦飞，生于1880年，湖北夏口人。因自幼好武，遂以武为名。孙武十八岁入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历任湖南新军教练、岳州武威营官带等职。1900年，吴禄贞、傅慈祥、唐才常等人回到国内，组织自立军，联络长江会党和水师营兵，准备发动起义。吴禄贞在到达上海时，曾致信孙武，约其参加此次起义。吴禄贞任大通起义军司令，孙武任岳州起义军司令。起义定于8月9日在汉口、大通、新堤等五处同时发



动。孰料当大通自立军如期举行起义时，其他地方的行动却先后遭到清政府凶残镇压，使大通自立军因孤立无援而失败。孙武当时幸得脱身，遂匆忙改姓逃往广东。此事史称“庚子汉口起事”。此后，孙武心怀复兴民族之梦，相继参加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湖北革命组织的各种活动。那时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日薄西山，全国各地，零星星的造反起事此起彼伏。萍醴起义失败，湖北大兴党狱，孙武隐居了一阵后北上，由此结识绿林中人。接着去了日本，并进入大森军事学校，与喻培伦、聂荆、焦达峰、黄复生、熊越山等人学制炸弹。共进会成立时，被推任军务部长。

1910年冬，同盟会会员谭人凤、宋教仁等人邀集十一省同盟会分会主持人在东京开会，以过去屡次在南方偏远省份发动起义收效甚微的教训，决定选在长江流域举行起义。谭人凤遂于1911年初到南京、九江、武汉等地考察网罗革命力量。此后更因广州起义失败，同盟会对策划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愈加积极，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还将同盟会的中部“总会”设于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通过共进会向武汉方面积极活动，逐渐知道文学社是武汉有力的革命团体，乃策动共进会与文学社合作。铁路风潮掀起时，文学社与共进会成员也意识到联合革命力量共图大举的时机已成熟，遂于8月组织了共同领导的机构，推蒋翊武为临时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在武昌小朝街85号设立临时总指挥部。此前孙武已携关防、同盟会和共进会规章誓约等回到武汉，联络会党，筹划起义。

但是会党并没有给孙武带来希望和信心。他觉得此前“运动官吏，官吏利禄熏心；联络会党，会党又野性难驯；今后惟有



武昌起义时  
密机关小朝  
85号

运动士兵，借矛夺盾。士兵自有枪械，是器械足；各有固定饷粮，是粮饷足；每日操练，是有纪律；又曾平匪治乱，是有历练。与其费资养人，不如运动士兵为妙。至于运动方法，应先结以义气，晓以革命利害。强调官长皆学堂出身，士兵万难升迁，不革命就无出路。士兵能明此理，就可为我所用。”<sup>[注1]</sup>主意既定，孙武开始吸引士兵加入共进会。为此，孙武还亲赴香港，在中国日报报馆与冯自由、胡汉民、洪承点等相识，并由冯介绍正式加入同盟会。后来孙武回到武汉，即利用共进会进一步在军队中开展活动。他决定要抓住军队做文章。

1911年2月，谭人凤、居正、杨杰时等革命党人也先后来到武汉。但他们很快感觉到武汉四面受敌，这样的情势不利于起义，比较而言，起义地点还是南方广州有利。

但这一建议遭到孙武反对，他认为在武汉发动起义，有三个有利因素：一是武汉为南北枢纽，自张之洞创办工厂、生产枪支弹药以来，二十多年来军火充足；加上湖南和江西又是近邻，有什么消息传递起来既快捷，也便于定夺；二是瑞澂这个人狂妄不讲理，对待缙绅又很傲慢，如今他主张“铁路国有”，与载振联手为奸，人们早已怨声载道，这样的民心我们正好利用；三是鄂省军队编练优于其他省份，以前其他省发生民变，即调鄂军剿抚，现在鄂军倡议，其他省军队将会闻风披靡，继而起来响应，既然是以军队为主，土匪就不敢随意滋事，至于租界如有什么事，完全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孙武从“地”、“时”、“人”三个方面作的分析终于得到了谭人凤等人的认同。谭还留下二百元作为活动费。在此应该注意的是，孙武提到了“铁路国有”。前面曾说到，即使张振武万不得已想提前起义，也缺乏孙武所指具有的“有利局势”，即是指这件事。因为“铁路国有”之事，正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索。在此，暂且还得放下孙武，先将目光转向这根导火索。

一触及这根导火索，就必须提到一个人，此人就是端方。

端方，字午桥，号勺斋，生于1861年，满洲正白旗人。二十一岁时中



孙武

举。《清史稿》记载：“端方性通脱，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毕、阮云。”毕、阮便是有清一代集显宦和宿儒于一身的毕沅、阮元。《清史稿》系官修史籍，将端方比之这二人，可见编纂者对端方博学能文的认同和称道。事实上端方在朝野口碑也不错。1911年5月，由于时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推荐，端方被清政府起用为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而此时铁路风潮正愈演愈

愈烈。清政府之所以接纳盛宣怀对端方的举荐，就是考虑到端方在湘、鄂两省任上，与地方绅民关系融洽，“若令其前去，善为劝导，必能弭祸无形”。然而，清政府这次算盘却打错了；而且这一错，竟把端方的性命也搭了进去。

铁路风潮正是起因于盛宣怀主持的“铁路国有”政策。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清末的铁路政策经历了一波三折：先是合股官办，后是商办，最后路权国有。在前两种形式的操作规程严重受挫后，盛宣怀开始力图转向操作铁路国有这一办法。在清政府看来，既然合股官办、商办不行，铁路路权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筹划，向西方银行借款，并聘请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建造铁路应是明智之举。这时候的清政府显然只顾“向前看”，而忽视了“向后看”。政府忽视了民营公司的“付出”。湖北、湖南两地商人以往投入到铁路民营公司的股份，清政府都如数偿还，惟有四川公司亏空的三百万元，盛宣怀却拒绝补偿。这也就是为什么铁路风潮掀起于多个省份，偏偏四川爆发得最为猛烈——原来四川民营铁路公司“付出”最多！所以它们要求政府承担其三百万元巨额亏损。

然而，盛宣怀拒绝的理由也很强硬：四川公司的亏损，是你们卷入1910年世界性的橡胶投机生意所致，凭什么要政府为你们承担！

交涉不成，参股民众的情绪就被激发起来了。一直以来，这股情绪一直

被冠以“爱国激情”的名义。既然民众属于“爱国”，受指责的另一方，亦即清政府当然就属于“卖国”了，指责的理由也很堂堂正正：中国人建造自己的铁路，却让外国人的资金参与进来，这不是卖国行径是什么！在这样的情势下，“商路亡，中国亡”的口号甫一喊出，铁路风潮顿时如干柴遇烈火，顺势燎原。

## 不合时宜的意外爆炸

端方在这时候出现，是清政府想让他平定这一严重失控的社会局势。可以说，端方是临危受命。当然，“临危”的是清政府，而并非端方本人。但是现在由于端方的出场，他的形象就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清政府。种种迹象表明，端方对自己此行带兵入川的前景并不乐观，所以他从领命起就没敢张扬，而且在进川路上，一直保持低调。在出发前和赴川途中，他还多次向朝廷谏言，要求朝廷废除“铁路国有”政策，以免刺激众怒，引发大规模骚乱。随他入川的幕僚后来曾这样向朝廷报告：“此行端故督上体朝廷德意，下念民生困苦，虽带有鄂军两标护行，实不主剿办宗旨。沿途皆由端故守竭诚演说，日行百余里，道路崎岖，宿于牛栏豕圈之间，寝食俱废。然遇村屯乡镇人烟稠密匪徒麇集之区，犹作舌敝唇焦口讲指划，务使川民皆感朝廷恩惠，解散胁从……是以每到一邑或一州一镇，人民皆备极欢迎，结彩舆前有如山积。”端方的家丁后来也向朝廷报告：“沿途饮食，并无菜蔬可食，每饭只有白饭咸菜。沿途所住之房即系养猪堆粪之屋，即钦差亦系此等之房。行至两三月均如是……到一处即鸣锣集众，寻一处宽敞庙所，六大人（指端方之弟端锦）前往演说……各界感情殷殷。”

这样的阵势哪像率军进剿平乱，倒更像朝廷派下来的慰问团；端方则就如一个勤政亲民的好干部，一路上极其自律，减少扰民。至少这一路上，他的行为处事应该说可圈可点。

端方奉旨率军由鄂入川，武汉守卫就露出了薄弱的软肋，革命党人凭着

敏感的政治嗅觉，顿时觉得这是起义的好时机；文学社领导下的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举行起义。

其实这场起义的准备，从响应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就已开始了，只是因为广州起义失败，武昌革命党人才取消了响应计划。但是广州起义毕竟鼓舞了全国的人心，奋斗了近十年的革命党人也更坚定了伺机起义的决心。现在四川保路风潮既起，鄂军西调，武汉空虚，正是起义的绝佳时机。

1911年9月24日，孙武、彭楚藩、杨宏胜、熊秉坤、蔡济民、胡祖舜、邓玉麟等三十余人，在武昌胭脂巷的革命分机关开会筹划起义事宜。此时蒋翊武去岳州活动未归，大家共推孙武为主席。当时议定以10月16日中秋为首义日期，并制定武昌城内外各标、营新军同时行动的计划。不料消息被新闻记者透露，官方得知后如临大敌，戒备更加严密。革命党人见此情形，自知准备不及，决定延期起义。但就在离原定起义日期还差一星期时，10月9日上午八时左右，意外发生了。意外的引发者，就是孙武——这位前任共进会军务部长，当时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22号楼上一间屋中，不小心把张振武带来的炸弹弄爆了。

关于这颗炸弹不合时宜的爆炸，有着多种说法，有说是孙武搬动炸弹时用力过猛，不小心撞破一旁的玻璃管，导致药水流入炸弹引起爆炸的；也有说孙武正在研制炸弹时，一旁有人吸烟不慎，火星飘进药内，引起爆炸。但不管因何原因引发，当时这颗炸弹突然爆炸，使孙武面部受伤，则是不争的史实。

街上一个正在巡逻的俄国巡捕听到了爆炸声，他顿时警觉地停下脚步，抬头四望。只一眼，他就看见了临街一扇窗户正冒出一股烟雾，感到有些奇怪，便决定上去看个究竟。

听到外面传来异样的脚步声，大家知道情况不妙，情急之中，有人抓过一件衣服蒙在孙武受伤的头上，连忙扶他下楼，溜出后门，喊住一辆人力车，前往同仁医院。与此同时，那个俄国巡捕也已进入了爆炸后一片狼藉的房间。

眼前的景象让俄国巡捕大吃一惊：只见屋内到处散落着碎铁片，还有炸药、炸弹、上百支手枪、几百套军装，以及准备起义用的旗帜！

俄国巡捕顿时意识到这里发生了什么，他不敢停留，赶紧回去向领事报告。

俄领事接报后，怕因事发于俄租界，湖广总督瑞澂会找他责询，便马上告知江汉关道齐耀珊。



蒋翊武（文学社负责人）

齐接报后，一面调集兵警去抓革命党，一面在电话中向瑞澂报告在俄租界发现了革命党据点。于是，清政府大规模搜捕革命党的行动之网就此张开，秘藏于宝善里22号的大量有关革命党人信息的名册、文件等重要档案，因此落入清政府手中。

革命党人刘公的寓所紧邻出事房屋（一说孙武制造炸弹处即刘公寓所）。刘系湖北襄阳人，其家为襄阳三大富户之一。刘早有革命思想，曾资助陈天华撰写的《警世钟》、《猛回头》印行；同盟会成立，率先加入；《民报》出版，又捐助巨金。后更以五千两白银资助武汉革命运动。共进会的活动，多赖这笔经费。刘家后来也迁居宝善里。孙武出事后，刘的家人与几位亲友未及撤离遭到逮捕，起义事也因此暴露。武汉三镇军警四处出动，进行搜捕。当天下午从岳州回到武昌的蒋翊武在小朝街总部，以总指挥名义发出紧急命令，决定提前于当天晚上十二时举行起义。

然而，蒋翊武的命令尚未传达到各标、各营，总部及其他机关又相继被清军破获，彭楚藩、杨宏胜等人遭到逮捕。此时武昌城已遍布军警，可谓草木皆兵。随着又有一批革命党人被捕，蒋翊武等人不得不匆忙逃出武昌。因起义命令已无法送达各处，原先商定是夜举义的行动，没能付诸实施。

此时，清军仍在按搜查到的革命党人名册进行搜索；并令各标、营封锁营门，不准兵士出入，不准交头接耳，要求各标、各营长官轮流巡查。一时

间军队中也人心惶惶，尤其是平时与革命党人有往来的兵士，更担心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官逼兵反，兵不得不反”，与其压抑自己，还不如让其爆发。起义的激情，就这样在他们胸中渐渐升腾涌出。

不过意外状况的发生，使得革命党人原定当晚发起的首义，结果又推迟了一天。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这一天，注定以流血开头。清晨，瑞澂先是下令将前一天抓到的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押到督署门前杀害。又让铁忠、张彪继续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扬言要将革命党人斩尽杀绝。

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当晚七时，驻扎在武昌城内黄土坡的第八镇所属工程第八营后队中的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见情势万分危急，就聚在一起，商议立即起而反抗之事。而一直对他们有所怀疑、密切注视着他们行动的该营排长陶启胜此时领着一队武装士兵突然闯了进来。陶启胜冲着金兆龙厉声呵斥道：“早知你们图谋不轨，想造反吗？”说罢，便喝令左右兵士把金兆龙他们绑起来。

只见金兆龙退后一步，大声喝道：“今日之事，乃我为政，今日之人，俱我同胞，谁也不能碰我！”<sup>[注2]</sup>随即大呼：“同志动手！”话音刚落，陶启胜身边闪出程正瀛，只见他举起枪托砸向陶的脑袋，陶立刻应声倒地。后据熊秉坤回忆，陶启胜当时系小腹中弹，第二天毙命。<sup>[注3]</sup>武昌首义序曲就此奏响。

且说一见头儿倒地，跟随来的士兵再也无心对抗，纷纷缴械。

既已事发，大家便发一声喊，一起朝楼下冲去。中途遇到另一个排长张文涛持枪阻止，当场被起义士兵击毙。第八营代理管带阮荣发、队官黄坤荣闻讯前来弹压，很快也倒在起义士兵面前。其他官兵见势不妙，连忙逃避。起义士兵把营内军械夺取一空后，跟随熊秉坤冲向城内楚望台。

楚望台是湖北新军军械库所在地，那里储藏有历年汉阳枪炮厂所制造的枪炮子弹及从国外购置的枪支。起义士兵进攻楚望台军械库几乎没遇到什么反抗。一是军械库守卫官吴兆麟闻风而逃；再则是得到了军械库士兵起义响应。所以，后来熊秉坤在回忆这一过程时说，“楚望台军械库唾手而得”。

但让起义官兵万没想到的是，得到军械库后，他们竟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

此时已是晚上八时，其他各营还没有动静，熊秉坤等显然有点手足无措。好在他很快平静下来，便派人前往革命党人较集中的各营，请他们立刻召集士兵前来会合。而当各营士兵闻讯赶来后，大家又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了。

这时候，第三十标的张鹏程突然站出来，大声建议道：“如此聚在楚望台，一到天亮，我们就完蛋了。应该立即进攻督署，把瑞澂杀了！”

正困惑于没有下一步进攻方向的起义士兵，立刻群情激奋，表示赞成。于是，这支秩序杂乱、没有人指挥的队伍就哗啦一下，兴冲冲地朝督署冲去，也许他们觉得夺下督署，会像拿下楚望台一样，依然可以“唾手而得”。

然而，这次他们想错了。严峻的现实很快就给了起义士兵一个打击：初次进攻被守备官兵打退，还损失了几名起义士兵。再进攻，仍然无功而返。几次进攻未果，大家再也沉不住气了，各持己见，各出主意，莫衷一是。纷乱中，才恍然意识到，现在太需要有个能人来指挥，群龙不能无首。

恰在这时，一个士兵在楚望台西南城下搜索到躲藏着的军械库守卫官吴兆麟，就把他带到了攻打督署的前沿。

吴兆麟，字畏三，生于1882年，湖北鄂城（今鄂州）人。1898年入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进工程营专门学校、湖北参谋学堂就读，毕业后回工程营任队官。1905年加入日知会。吴平时颇为士兵信服，此时不容他推辞，大家当场恳请他担任临时总指挥。吴也不忸怩，振作起精神，先向大家申明纪律，然后分析了城内清军火力布置后，就下令重新进攻督署。

## 革命本来不关黎元洪什么事

时任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旅的编制）协统黎元洪在武昌首义爆发的最初，是阻挠新军起义的角色，当时他亲自坐镇第四十一标第三营。但随着战况加剧，不知怎么想的，他那天趁夜躲到了一个幕僚家里，闭门不出。



黎元洪最初听到工程营兵变，并不在意。后来当他接到报告，得知其中有他统领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直属工、辎各队及炮队亦有一部分兵变，这才集合第四十一标留营全体将官于会议厅。黎元洪一言不发，更不下命令。过了许久，大家终于明白了，原来他是借此把自己手中的兵力集中在这里，以防不测。

黎元洪，字宋卿，生于1864年，湖北黄陂人。1883年入北洋水师学堂，1888年毕业后，派赴德国留学，回国后加入海军阵营，在“广甲”舰上任职。1894年中、日两国海军在黄海大战，“广甲”舰奉命增援，不幸于途中被敌舰击沉。将士全部落水。黎元洪凫水拣回一条命后，于次年往南京，投奔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延才馆”，渐渐露出治军才能，后受委派，三度赴日考察军事。十年下来，黎努力不辍，终于一步步走到了今天，成为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

这时，卫兵进来报告，抓到了一个工程营秘密派来给本协送信的人。那个姓周的送信人被押进了会议厅。

黎元洪亲自审讯此人，问清来历后，黎决定杀一儆百，只见他手起刀落，当场将周杀死于会议厅。见到这场面，在场官兵个个噤若寒蝉，不敢出声。只是接着又听到外面革命军与清军互相炮击时，士兵又开始骚动起来。见此情况，黎元洪下令：官佐各自回营，注意炮弹袭击，但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不要有负皇恩，能坚守到底，将来定予重赏。不过他接着又说，否则的话，请大家自便，他黎元洪已无法对大家负责。说完这番话，黎元洪就离开会议厅，径自前往自己的部下、参谋刘文吉家去躲避了。

黎元洪的这番举动，不要说当时的手下，就是今天的史学研究者也感到纳闷。

没过多久，参与起义的巡查汤启发率领士兵，在刘宅找到黎，要他出来担任总指挥。

黎说：我平日带兵待你们并不刻薄，你们今天为何来为难我？

大家说：我们来此，专门请您出来做指挥，商量出主意，没有恶意啊！